

北京大學中文系與韓國的中文教學

- 有關北京大學創立百年的中文論文及韓文會議參觀記

張東天*

<目次>

1. 序言
2. 日據時期至冷戰時期的式微
3. 冷戰體制的瓦解和前所未有的盛況
4. 北大中文系與韓國再結新緣
5. 代結：韓國中文教學的現狀及北大中文系承擔的作用

1. 序言

很久以來，韓國與中國浸潤於共同的文化傳統中。在難以計數的史籍中留有兩國文化交流的印記。例如，朝鮮派往清朝的燕行使節歸國之後記錄中國見聞的燕行錄，僅傳至今日的便多達500種以上，這些對中國的實地考察文章引發了既有創見又追求實用的“實學”熱潮。《燕行錄》目前在中國，也被視為海外描寫近代中國的寶貴遺產。韓中之間的深入交流是在人文典籍形成的文化紐帶的作用下實現的，成為文化紐帶的不僅是文言典籍，為使口頭交際能夠順利進行，早在高麗王朝末年就出現了專門為譯官編纂的漢語教材《老乞大》和《朴通事》，這兩部教材直至20世紀初都在使用，這說明韓國為了加強與中國的交流很早就認識到了漢語教學的必要性。

www.kci.go.kr

* 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教授。

但是，進入20世紀後，由於歷史的原因，韓中兩國的交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中斷。隨著1992年外交關係的恢復，韓中之間的文化交流上出現了飛躍性的進展。一個世紀以前封建文化系統中維持的韓中交流，在現代的文化環境中產生了從未有過的劃時代變化。而進入二十世紀後一直擔負著現代教育重任的高等學府，在全新的韓中文化交流中，也起到了橋頭堡作用，韓國社會對大學的中文教學產生了從未有過的期待。在所有的變化之中，北京大學中文系在韓國的中文教學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從本文對韓國與中國通過中文教學發生的文化交涉的歷史考察中，我們可以看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對韓國中文教學產生了何種影響，其意義何在，並可展望未來的發展前景。

2. 日據時期至冷戰時期的式微

據現存史料，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韓國的漢語教學主要由北京出身的滿洲人使用《老乞大》等舊教材以傳統方式進行。1927年，一位接到韓國大學正式邀請的中國教授來到韓國任教並以現代方法講授漢語，成為來韓的第一位中國人教授，他就是北京大學的著名語言學者魏建功(1901-1980)先生。¹⁾ 魏教授在韓國寫成長達十五回的韓國采訪錄《僑韓碎談》，發表在《語絲》上。但是當時是日據時期，魏建功教授的首爾之行與韓國人的意向無關，只是殖民主義者的教學需要，因而算不上真正的韓中交流。事實上，從1926年京城帝國大學創立“法文學部(法律文學部)”起到1945年韓國光復該校關閉，“支那文學系”的韓國人畢業生不過八名而已。²⁾

1) 金在旭,《試探魏建功的僑韓碎談》(韓文,《中國語文學志》,中國語文學會,29卷,2009),48頁。

2) 這八位學人畢業後在中文教學或文壇寫作方面,都起了不少作用。千眞,《殖民朝鮮之支那文學的命運——以京城帝國大學支那文學系為中心》(韓文,《中國現代文學》,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54輯,2010),318-319頁。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不少韓國留學生爲了求學跑到北京。特別是在1923年東京發生關東大地震以後，原來想去日本的很多人，爲了躲避日本對韓國人的迫害選擇了中國，在中韓國留學生人數急增，其中大部分居於北京和上海。據統計，僅1924年，北京的韓國留學生就多達三百餘名，在北京大學學習的最多。³⁾ 在曾攻讀或畢業於北京大學的韓國人中，有很多成爲韓國現代文化史的中堅力量，如韓語學者鄭寅普和李允宰、小說家韓何雲、劇作家沈熏等。他們選擇北京的理由，也與殖民地朝鮮半島的獨立運動及流亡史有密切關係。在中國的很多韓國留學生，其留學既是爲了自我成長也是爲了祖國獨立。

雖然如此，由於過去中國的學制與現在不同，無法清楚得知他們之中具體有多少人畢業於中文系。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的金九經在韓國光復第二年的1946年成爲國立首爾大學中文系的教授。⁴⁾ 如上所言，在韓國中文教學萌芽之際，首次來韓任教的教授即爲北大中文系的學者，而在韓國光復重新建設中文教學之時，也由北大中文系畢業的韓國人發揮了領導作用。因此，談及韓國早期的中文教學，便不可忽視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脈。

在重重困難中延續的韓中文化交流，在1945年韓國光復以後遇到了更爲嚴重的障礙。衆所周知，1948年，南北韓各自成立獨立政府，韓半島的分斷成爲定局。1949年，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1950年爆發了韓國戰爭，冷戰的烏雲密布於整個東北亞的上空。萌芽漸生的北京大學和韓國中文教學的因緣幾乎斷盡。韓國1970年代以前創立的三所大學的中文系，即國立首爾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1954)、成均館大學(1955)中文系的課堂上不能再學習“現在的中國”，繼承傳統教學方式的台灣代替中國大陸成爲主要的交流窗口，也造成韓國光復以後直至1980年代，培養的中文學者，其主要留學地只能是台灣的特殊情況。

雖然如此，進入1970年代，韓國的中文教學還是出現了第一次發展壯大的局

3) 趙誠煥,《在北京的記憶及被敘寫的北京》(韓文,《中國學》,韓國中國學會,27輯,2006),344-345頁。

4) 金九經(1900-?),佛教學者兼書志學者,與魏建功關係良好,並由魏建功介紹給周作人,也曾與魯迅相見。他1929-1931年在北京大學任教,1950年韓國戰爭爆發以後,被綁架到北朝鮮。詳見金時俊《與魯迅會面的韓國人》(韓文,《中國現代文學》,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13輯,1997),147-156頁。

面。韓國主要的私立大學，高麗大學、檀國大學、淑明女子大學於1972年，延世大學(1974)和梨花女子大學(1981)等，都創立了中文系(即“中語中文學科”)。到1981年全國有38所大學設立了中文專業。⁵⁾雖然在課程方面仍然依靠傳統式的漢學與台灣式的中文教學方法，但是這麼多的大學新設中文系的原因，不僅在於台灣，更在於與中國大陸恢復關係的熱切希望及對未來交流做準備的心理。無論如何，中文教學的第一次擴張，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發生的第二次擴張在教學資源方面提供了充分的準備。

3. 冷戰體制的瓦解和前所未有的盛況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韓國和中國在政治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在長達二十多年的軍人統治中，韓國社會連續不斷地爆發爭取民主的激烈鬥爭，在這一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大學都成為民主鬥爭的基地。對中國的關心逐漸從以台灣為主的“傳統中國”轉移到以大陸為主的“現代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李泳禧教授編譯的《與八億人的對話》(1977)和《中國白皮書》(1982)，以及埃德加·斯諾敘寫延安解放區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西行漫記》)(1985)等書籍雖然一經出版即被列為禁書，但在大學校園裏卻廣為傳播。此時的中國正在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開始踏足國際社會。中國政府也開始允許韓國學者進入中國，進行非正式學術交流。不過上述變化對韓國境內中文教學的影響微不足道，韓國依然採用以繁體字和注音符號為代表的台灣式教學方法。

韓國和中國建交前夕，兩國交流史上出現了一件必須提及的大事，此事也給韓國中文教學的轉變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這就是1989年起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開始出版中韓大辭典系列。該辭典大略收錄三十萬詞彙，這一龐大工程在1972年開始規劃後，有三百人次參加，花費了整整二十年的功夫，才終於完成。該辭典

5) 劉繼紅，《當代韓國漢語教育發展分析》(《黑龍江高教研究》2005年3期)，159頁。

的編纂工作即由以李東鄉教授為首的高麗大學中文系教授負責，北京大學中文系方面也由陸儉明教授參加校閱和監修工作。在韓中兩國建交之前，北大中文系已經通過韓國一個大規模的辭典編纂事業重新正式開始了與韓國的文化交流。

1992年的韓中建交使韓國中文教學界得到煥然一新的發展契機，帶來了第二次壯大發展。這一時期的發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察，首先是有關漢語教育系統的變化。與過去相比，最顯著的不同是採用簡體字和漢語拼音進行教學，並使用大陸的教材和教學方法。⁶⁾第二個是教授資源的變化。此時韓國各大學中文系的外國人客座教授從以前聘自台灣一變而為大量聘請來自大陸的教授。第三是留學情況的變化。通向中國大陸的留學大門重被開啓，從中國大陸得到學位的韓國人逐漸增加。最後第四個便是隨著兩國外交關係的建立，刮起了一陣“中國熱風”。在韓國的大學裏，中文系或者中國學系一時之間大為增加，開設有關專業的大學在1990年代末增至116所。⁷⁾上述變化幾乎影響到韓國中文教學的所有領域。

韓中建交也給研究生院的教學帶來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一，很容易便能閱讀到中國的資料。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韓國學者想要得到中國的一些資料尚需要經過第三國，九十年代以後則可以去中國或者在首爾的中國書店直接購買。意識形態方面的種種禁忌消失了，圖書館裏能查閱到的資料更加豐富了。第二，韓中之間的學術交流非常活躍。個人可以進行或長或短的學術性訪問，在共同主題之下開辦的學術研討會也不斷增加。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主要是中國學者應邀參加韓國舉辦的各種會議，但在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方面舉辦的國際會議日漸增多，韓國學者的中國之行也日見頻繁。第三，一個新的趨勢於最近出現，那就是雙方都在追求學術項目的合作。如，參加對方的學術計劃或者在對方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等等。到目前為止，兩國在這些方面的交流經驗已經很豐富，體制上也沒有什麼根本性的障礙。上述研究資料的多樣化以及各種頻繁的學術交流都對大力培養中國專家的韓國研究生院的中文教學活動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研究生院中文系語言文學教學

6) 這樣的趨勢在建交之前已經慢慢抬頭，如高麗大學中文系1981年出版的《教養中國語》(即初級漢語)課本雖然仍然採用繁體字，但是已經使用漢語拼音來注音。據筆者記憶，該教材應該是1985年前後中國大陸對外漢語課本的影印本。

7) 參照韓國中國學會《1999年度會員名簿》(韓文)所列。

的領域被不斷拓寬，教學內容的深度也在不斷加強。

4. 北大中文系與韓國再結新緣

在韓中建交以來深入開展的文化交流中，北大中文系給韓國的中文教學帶來了很多重要影響，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首先是人力資源的交流。在首爾主要大學中文系從事過教學工作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有，任教於高麗大學的侯學超、黃書雄、漆永祥教授（以上安岩校園），以及溫儒敏、韓毓海、葉文希、計壁瑞、胡敕瑞教授（以上世宗校園）。韓國外國語大學則有郭銳、朱慶之、欽善、周先慎、商金林、車權山、孫玉文、袁毓林、張沛教授。梨花女子大學有張雙棣、李更、陳連山、孔慶東、董秀芳、吳曉東、沈培、陳德禮教授。國立首爾大學有高遠東教授一人。他們都曾在韓國工作過一年或者兩年。此外，來韓參加韓國主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有嚴家炎、樂黛雲、葛曉音、錢理群、段寶林、嚴紹盪、洪子誠、張少康、陸儉明、蔣紹愚、馬真、陳平原、楊榮祥、張頤武、安平秋、邵燕君、戴錦華、曹文軒、賀桂梅教授等，可說是舉不勝舉。⁸⁾

與此相對，訪問過北大中文系的韓國學者更是為數甚多，在此略過不談。上個世紀末以來，還有一個較為突出的現象就是在北大中文系拿到學位的韓國人才終於登上了韓國大學的講台。如趙冬梅、金曉民（以上高麗大學）、邊滢雨（成均館大學）、沈小喜、申夏閏（以上梨花女大）、蘇恩希（淑明女大）、朴永煥（東國大學）、姜炳圭（首爾市立大學）、洪竣榮（同德女大）、宋眞榮（水原大學）、徐聖（開放網絡大學），等等。韓中建交以來，在韓國各大學中文系的海外留學派專職教員中，北大中文系的畢業生居於首位。不管是中國人教授還是曾經留學北大的韓國人教授，如此活躍的人才交流都是對韓國中文教學的最直接的影響。

其次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撰寫的學術專著帶給韓國中文學界的影響，這些影響在

8) 歷任中國人客座教授的名單，根據四所大學中文系辦公室所提供的資料。

各個專業領域雖各有不同，但大體來講，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有關漢語史及中國文學史的教材或總論性著作，二是提出獨到的新觀點及新的方法論的專業書籍，這些著作尤其影響到研究生院的教學工作。學生們通過閱讀出自北大中文系學者之手的學術材料，可以把握到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及批評標準。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以下著作對韓國研究生院的教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漢語研究方面，唐作藩教授的《漢語音韻學常識》(1958)及《音韻學教程》(1987)，陸俊明教授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2003)，郭銳教授的《現代漢語詞類研究》(2002)及《現代漢語語法信息詞典詳解》(2003)，袁毓林教授的《漢語語法研究的認知視野》(2004)，以及蔣紹愚教授的《近代漢語研究概要》(2005)等。這些著作目前幾乎成為漢語專業學生的必讀書籍。

相對來講，與漢語學著作相比，中國文學方面的專著被譯為韓文的較多。古代文學方面較有影響力的著作有王力教授的《漢語詩律學》(1958)，袁行霈教授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1987)，陳平原教授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蔣紹愚教授的《唐詩語言研究》(1990)等等，這些都是研究生教學的常用書籍。⁹⁾

在現當代文學教學方面影響力較大的有錢理群等三位教授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87)，溫儒敏教授的《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1988)及《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1993)，嚴家炎教授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1989)，洪子誠教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99)，孫玉石教授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1999)，等等。這些書在基礎教學方面被列為推薦書目。1990年代，韓國也像中國一樣，開始接受後現代主義，並且圍繞著“現代性”這一論題進行了深入討論，中文研究界對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分期和特征甚為關注。特別是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教授共同發表的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曾在韓國中文研究界引起廣泛反響。最近，一些和戴錦華教授的《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2000)一樣融合文化論的學術著作，不但在大學而且在一般的大眾讀者中，也受到廣泛歡迎。¹⁰⁾

9) 以上有關漢語學方面的學術專著書目由高麗大學崔圭鉉教授提供，古代文學方面的專著由高麗大學金俊濶教授和趙冬梅教授提供。借此向三位表示謝意。

10) 被譯為韓文的專書有：《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文學史研究叢書》(溫儒敏著，1991年翻譯出版)、《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溫儒敏，1994)、《中國詩歌藝術研究》(袁行霈，1994)、《中

在建交不久中國客座教授剛剛來訪的時候，得到直接向中國人教授學習的機會便可以滿足學生，雖然其教學效果也不容忽視，但是隨著學生們接觸中國原語民的機會越來越多，以及媒體與網絡的飛快發展，學生對外國人教學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所以最近各所大學對聘請客座教授的要求較之以前更為具體、嚴格。通過客座教授展開的人才交流，其影響所及範圍在大學校園之內，而相互之間通過書籍和學術觀點的交流雖然不像教師與學生面對面的溝通那樣產生直接效果，但卻具有更為深入、久遠的影響力。尤其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成果在韓國經常成為超越中文系範疇的關注對象，應該說它對韓國的一般學術界有著一定的影響力。有時，文化交流成敗的關鍵在於翻譯者，中國的學術水平越高、成果越多，韓國中文系作為中介者(翻譯者)的作用自然會更受到重視。

5. 代結：韓國中文教學的現狀及北大中文系承擔的作用

表面看來，韓國的中文教學似乎在最近二十年之間無論在量上還是在質上都在迅猛發展，但是前景卻未必樂觀。目前韓國的漢語教學市場已經超出了大學中文系所能控制的教學領域。與此同時，各所大學千帆競發地創設的中文系已趨飽和，一些大學甚至正在考慮中文系的改造或合並。因為中文系也無法回避韓國社會共同面臨的“就業難”的結構性問題。因此，目前來看，韓國的中文教學規模雖然不小，但卻

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陳平原, 1994)、《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嚴家炎, 1997)、《彩色插圖中國文學史》(錢理群等人, 2000)、《中國當代文學史》(洪子誠, 2000)、《中國當代新詩史》(洪子誠、劉登翰, 2000)、《音韻學教程》(唐作藩, 2000)、《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論》(張少康, 2000)、《山水田園詩派研究》(葛曉音, 2002)、《小說史: 理論與實踐》(陳平原, 2004)、《漢語詩律學》(王力, 2005)、《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戴錦華, 2006)、《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陸儉明, 2007)、《現代漢字學綱要》(蘇培成, 2007)、《霧中風景: 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戴錦華, 2007)、《詞義的分析和描寫》(符淮青, 2008)、《鏡城地形圖—當代文化書寫與研究》(戴錦華, 2009)、《古代小說書目簡論》(潘建國, 2010)、《拒絕遺忘: “1957年學”研究筆記》(錢理群, 正在翻譯)、《唐詩語言研究》(蔣紹愚, 正在翻譯)。以上翻譯數目, 根據碩士班的金美榮助教在網路上查尋。

很不穩定。隨著社會需要的變化，各所大學正在推行改變課程的策略，並將傳統教學內容融於各種應用科目，或者以與中國大學合作辦學等方案謀求競爭上的優勢。同時，大學經營者為了解決生源減少的問題，積極招收中國留學生，目前在韓中國留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五萬人。

本科教育的各種困難影響到研究生院的教育。雖然開設研究生院的院校在所有設立中文系或者中國學系本科的學校中不到八分之一，但是研究生院的入學競爭率比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低得多。有些研究生院由於得到政府資助的學術項目，或由於取得研究生獎學金尚足以維持，不過總的來看，因為學生的未來(當教授)很不確定，吸引優秀人力資源進入研究生院越來越難。再加上社會各個領域對大學的教學及研究成就的評價越來越嚴格，在如此急變的潮流中，韓國的中文系在固守人文學的純粹性以及隨著社會需要加強功能性的兩條道路上躊躇徘徊，在思考、堅持的同時，也在努力適應變化。

韓國中文系的危機也要求韓中交流方面有新的轉變。隨著基層漢語使用者的擴大，對中國的交流也擴展到社會的所有領域，所以中文系的角色也不得不加以改變。尤其是進入本世紀後，社會對中文學的期待不再是純粹以語言文學為主的學科，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地域學的據點，這在教學和研究兩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目前，韓國的中文系正在逐漸從以往大部分中文系堅持的語言文學為主的教學中走出來，追求語言教學的多元化，文學教學也逐漸與文化教學相融合，並探索中文教學和其他學問之間的跨領域合作。¹¹⁾ 上述種種變化指向的目標，也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和韓國中文學界交流的前途所在。

北大中文系在純粹學問領域做出的努力及努力的成果，會成為世界漢語研究及中國文學研究界的榜樣。北大中文系提供的教學資源也會如現在一樣，持續影響到海外的中文教學。不過作為“外國學”或者“海外地域學”之一的韓國中文學科與作為“國學”的中國中文學科畢竟有所不同。所以教學領域上的交流與學術領域的交流也不盡相同，需要更多地考慮到交流內容的特殊性。如上所言，目前雙方的交流基本

11) 例如，高麗大學中文系為完成國家級大型學術項目，到2012年為止，研究生部暫與日文系合並，這是因為兩系研究生部的合並在開展學術事業方面多有便利，也會取得更多成就。

在於人力資源的利用以及學術成果、信息情報的傳遞，而未來兩國中文教學的需要一定會比現在更加多元化，也需要我們開拓更多的合作領域。在迎來北京大學中文系百年系慶之際，期待在今後的漢語教學及中國文化教學方面，北大中文系和韓國的有關校系開展更多的交流，並共同收獲更多的豐碩成果。

북경대학 중문과와 중문과 교육의 현재

- 북경대학 중문과 창설 100주년 기념 학과장 포럼 참가기

북경대 중문과가 창설 100주년을 맞았다. 1898년에 개교한 경사대학당(京師大學堂)은 개교당시 문학 강의는 있었지만 독립된 문학 학과가 없었다. 이 대학에 분과대학(分科大學)이 성립되면서 ‘중국문학문(中國文學門)’이 독립적인 체제로 출범한 것이 1910년 3월 21일이었다. 중국문학문은 1919년에 ‘중국문학과’로 개명되었고, 1925년 다시 분과전수제(分科專修制)에 의해 개편되었으며, 중일전쟁기간에는 칭화(淸華)·남개(南開)대학과 함께 곤명(昆明)에서 서남연합대학(西南聯大)이라는 피란대학으로 공동 운영되기도 했다. 북경대학 중문과는 사회주의 중국의 성립 이후 1952년에 칭화대학과 연경(燕京)대학 중문과를, 1954년에 중산(中山)대학 중문과를 흡수하면서 또 한 차례 전면적인 구조조정을 겪었다. 마침내 1964년에 고전문헌(古典文獻) 전공이 최후로 증편되었으나, 문화대혁명 기간 동안 거의 폐교 직전까지 갔다가 개혁개방 이후 차츰 원상회복하여, 언어학·문학·문헌학의 3대 전공 영역을 아우르는 현재의 체제로 완비되기에 이른다.

사실 북경대 중문과의 이러한 역사는 국학으로서 근대적 중국어문학이 성립하고 발전해온 역사에 상당하며, 근대 중국의 중문과 교육, 더 넓게는 국학 교육의 역사를 압축해서 보여주는 것이다. 중국 근현대어문학의 전통을 수립한 린수(林紆)·루쉰(魯迅)·류스페이(劉師培)·우메이(吳梅)·저우쥘런(周作人)·핑쉬룬(馬敘倫)·황간(黃侃)·첸셴통(錢玄同)·선젠스(沈兼士)·양진성(楊振聲)·류반농(劉半農)·후스(胡適)·마위짜오(馬裕藻)·쑤카이디(孫楷第)·뤄창페이(羅常培)·여우궈언(遊國恩)·양후이(楊晦)·왕리(王力)·펑완쥘(馮沅君)·위핑보(俞平伯)·페이밍(廢名)·탕란(唐蘭)·웨이젠공(魏建功)·선충원(沈從文) 등 이름만 들어도 알 수 있는 수많은 대학자들이 북경대학의 강단을 거쳐 갔다. 단적인 예로, 54 신문화

운동을 상징하는 양대 사조, 즉 사회참여적인 ‘문학혁명(文學革命)’ 운동과 아카데미즘 경향의 ‘국고정리(國故整理)’ 운동이 모두 한 학과를 중심으로 일어났던 셈이다. 화려한 역사는 교수진뿐 아니라 원무민(溫儒敏) 전 학과장이 창과 100주년을 기념하여 발표한 <북경대 중문과 100년의 유명 교수 100명 北大中文系100年來的100位知名校友> 명단의 쟁쟁한 동문 면면에서도 다시 확인된다. 이런 까닭에 북경대 중문과의 전공교육이 학제 구성과 학문적 성격, 교과과정 뿐 아니라 심지어 정치적 성향에 이르기까지 중국의 국학 교육에서 갖는 의미는 각별하다고 할 수 있다.

주지하다시피 지난 세기를 접으면서 중국에서는 100년의 역사를 반추하는 갖가지 기념사업이 벌어진 바 있다. 민족적 수난과 그 극복의 역사로 집철된 중국 근현대사의 특수성을 생각할 때 100년이라는 시간은 예사로울 수가 없었을 것이다. 더욱이 후발 근대 국가인 중국에서 대학의 역사는 예측 불허의 격변을 동반한 민족의 중흥사와 겹쳐질 수밖에 없다. 왜냐하면 대학의 역사는 중국이 봉건국가에서 근대국가로 재편되고 다시 현대사회로 진입하는 과정에서 최고 학부로서 교육과 학술적인 역량을 제공하는 동시에 사회발전을 선도해가는 여정이었다고 할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중국의 대학이 순수 교육기관으로서의 역할을 수행했을 뿐 아니라 역사와 함께 동고동락 해왔다는 사실은, 그만큼 역사적 수난기에 대학에 대한 사회적 기대가 작지 않았음을 반증한다. 그러나 100년의 성적표를 매기기에 앞서, 북경대학 중문과는 또한 과거와 사뭇 다른 양상의 현실 속에서 생존을 도모해야 한다. 북경대학 중문과가 100년사를 반추하는 갖가지 행사를 대대적으로 기획한 것은 단순히 지나온 역사만을 기리고자 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중문과의 현재 위상과 미래 역할을 가늠해 보기 위함일 것이다.

북경대학 중문과는 창과 100년을 기리기 위해 다양한 행사를 준비했다. 학과 역사와 관련한 서적 출판은 물론이고, 후스(胡適)와 같은 선학들에 관한 인문 강좌 시리즈가 연초부터 기획되었다. 메인행사는 경축기념식과 학생문예발표회로 시작되었다. 100주년 경축 기념식에는 각계 인사와 원로 교수를 비롯하여, 1,000여 명의 동문이 참석했다. 북경대 재직 교수로는 천평위안(陳平原) 학과장과, 북경

대 중문과의 원로교수로서 현재 중국 국학원 원장을 맡고 있기도 한 위안싱페이(袁行沛) 교수가 치사를 통해 100주년의 의미를 설명했다. 흥미로웠던 것은 졸업생을 대표하여 작가 류진윈(劉震雲)이 연설한 학창생활에 대한 회고였다. 그는 “중문과는 작가를 육성하지 않지만, 한 작가가 중문과를 졸업했다는 사실은 그가 얼마나 멀리까지 가느냐에 지대한 영향을 끼친다”는 말을 남겼다. 본과생이 중심이 되어 준비한 문예발표회는 오랫동안 연습한 흔적이 역력한, 아마추어로서는 매우 수준이 높은 공연을 보여주었다. 《시경 詩經》을 응용한 콩트로부터 실험극에 이르기까지 학부생들의 다양한 면모를 살펴볼 수 있었다. 이어서 학술행사로서 ‘중문과 교육의 과거와 현재, 그리고 미래’ 학과장 포럼이 개최되었고, 마지막으로 사흘에 걸쳐 대륙·대만·홍콩 양인3지 박사생들의 중국어문학 포럼이 진행되었다.

100주년 기념식장에서 북경대 중문과 천핑위안(陳平原) 학과장이 밝힌 북경대의 현주소는 수치만 보면 그리 화려할 것은 없다. 북경대학 중문과는 100년간 전일제 학부생은 7,285명, 석사 1701명, 박사 778명(외국인 유학생 포함)이 졸업했고, 매년 평균 80-100명 정도의 신입생을 받는다고 한다. 그러나 질적인 측면에서 북경대 중문과의 구성원들이 지닌 저력은 간과할 수 없다. 예를 들면, 대학입사에서 인문계의 성급(省級) 1위 성적 보유자가 종전보다 줄어들기는 했지만 작년만 해도 4명이나 된다고 한다. 이처럼 우수한 인재들이 입학하다 보니 학부생의 졸업 후 진로도 대학원 진학이 80% 이상을 차지한다고 한다. 천핑위안 학과장은 《신경보 新京報》와의 인터뷰에서 세간의 우려를 의식한 듯, “북경대 중문과는 생존에 문제가 없다”고 말했는데, 그들에게도 위기가 있다면 그것은 과거에 비해 그렇다는 것이지, 북경대학만이 당면한 문제는 아닌 듯 했다. 아닌 게 아니라 시장경제 체제 하에서 인문학 전공으로서 중문과가 직면한 목전의 위상 변화는 이어진 학과장 포럼에서도 단연 중요한 이슈가 되었다.

학과장 포럼은 북경대학의 전임 학과장을 비롯, 중국 전역에서 온 중문과 학과장(또는 문학원 원장), 대만·홍콩·싱가포르 등 중국어권 대학의 중문과 학과장, 그리고 한국·일본·영국·미국·태국 등지의 중문과 학과장에 이르기까지 37명

이 참여한, 비공개회의의 치고는 비교적 규모가 큰 국제회의였다. 하루 종일 열린 회의는 크게 북경대 중문과 전임 학과장들의 기조연설이 한 세션을 형성하고, 북경대학 중문과의 창설 100주년과 관련한 해외 학과장들의 발언이 한 세션을 이루었다. 또한 대만·홍콩·싱가포르에서 온 학과장들의 전공교육 현황에 대한 각론들이 또 한 세션이 되고, 마지막으로 가장 큰 세션은 메인테마를 중심으로 한 중국 대륙 학과장들의 발표로 구성되었다.

전임 학과장으로서 기조발언자로 나선 쑤위스(孫玉石)·옌자옌(嚴家炎)·원루민 교수는 공교롭게도 모두 현대문학 전공 교수들이다. 먼저 쑤 교수는 북경대학 중문과의 위기를 ‘주변화(邊緣化)’의 문제, 즉 전반적인 인문학의 외면 현상과 연결 지었다. 그는 ‘갑골학(甲骨學)’ 같은 강의가 개설되지 못하는 반면, 학술이 점차 시장화·산업화·매체화 되는 것에 대해 우려를 표했다. 순수 학문을 외면하는 이런 추세는 공허한 구호에 불과하며 학문적 심도를 가진 교수준의 인력을 배출할 수 없다는 것이다. 이와 관련하여 현행의 연구 평가제도 역시 장시간이 소요되는 연구를 불가능하게 한다고 비판하였다. 옌자옌 교수는 중국문학의 근대성 문제와 관련된 최근의 생각을 발표했다. 그는 중국에서 말하는 ‘현·당대문학’의 근원은 1880~90년대까지 소급되어야 한다고 주장하며 만청시기 한방칭(韓邦慶)의 《해상화열전 海上花列傳》과 황견센(黃遵憲)이 제시했던 ‘언문(言文)’을 그 예로 들었다. 이는 이미 그가 올 초에 출간한 3권에 달하는 《20세기 중국문학사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에서 언급했던 것이다. 그는 또 현대문학의 뿌리를 강조하는 동시에 세계문학사적인 배경을 중시하면서, 근대·현대·당대문학 연구의 통합 필요성을 피력했다. 원루민 교수는 과제(프로젝트, ‘項目’) 위주의 연구풍토에 대한 자신의 견해를 피력했다. 그는 연구 과제를 만들어내지 못하면 대학 내에서 생존하지 못하게 된 세태를 비판했다. 그는 젊은 세대일수록 이런 현상이 더욱 심해, 그들이 프로젝트 만능주의에서 벗어나 창조적 연구를 할 수 있도록 여건을 만들어 가야 한다고 주장했다. 그는 또 본과교육의 중요성을 역설하고 이를 위해 많은 한계를 극복하며 가자고 말했다. 이제는 북경대학의 원로 교수가 된 전임 학과장들은 북경대의 변화된 학술적 위상에 대한 위기감을 공통적으로 피력하였다. 이는 위안싱페이

교수가 전날 기념식장에서 한 치사를 통해 거듭 ‘인문정신을 강조했던 것과는 같은 맥락이라 할 수 있다.

해외 중문과 학과장들은 각국의 중국어문학 교육과 북경대 중문과의 관계에 대해서 주로 다루었다. 중국어문학의 ‘전과’(중국식 표현에 따르자면)는 문화의 공유라는 측면에서 뿐 아니라 교육과 연구 네트워크의 해외 확장이라는 측면에서도 중요한 의미를 지닌다. 제국주의 시대로부터 해외의 중국학을 선도했던 일본과, 이념적인 문제로 오랜 공백기를 가진 한국은 비교적 특수한 상황이라 할 수 있지만, 해외의 중국어문학 교육에서 북경대학이 갖는 상징성은 작지 않다. 그러나 교육종사자 중 화교의 비중이 높고, 포럼에서의 발표도 전체적으로 분석적인 글이라기보다 치사에 가까운 문장이 많았다. 이와 상대적으로 대만과 홍콩, 싱가포르의 중국어문학 교육은 한국이나 일본·태국·영국처럼 완전한 비 모국어권도 아니고 대륙과도 상당한 차이가 있는 제 3의 입장에 있다고 할 수 있다. 그들은 각 학과의 전공교육 현황을 중심으로 발제를 이어갔다. 가령, 5.4문학을 이해하기 위해 모의 시위 행사를 한다든지(대만대학 중문과) 하는 일련의 색다른 시도에 대한 발표가 이어졌지만, 각 나라 혹은 지역별로 교육시스템의 차이가 있기 때문에 각론을 넘어서는 보편성을 띤 논점은 보이지 않았다.

중국 대륙 학과장들의 포럼은 발제자가 많고 다양한 관점이 개진되어 한마디로 요약하기는 어렵지만, 대체적으로 기초발언에서 제기된 문제의식이 부연되는 느낌이였다. 우리가 한자를 잘 모르는 젊은 세대를 걱정하듯이 그들 역시 쉬운 성어의 뜻 하나 이해하지 못하는 요즘 대학생들의 지식수준을 우려했다. 어쩌면 외국 학으로 중국어문학을 대하는 우리보다 국학으로서 중국어문학을 대하는 그들에게 이것은 더 심각한 문제일 수 있었다. 교육지책으로 중국고전 100여 편을 제시하고, 이를 통째로 정독 또는 암송하게 한다는 다소 진부한 방법까지 대안으로 소개될 정도였다. 각론은 차치하고 전체적으로 보았을 때, 중국 고전의 독해능력을 심화하는 것은 그들에게 관건적인 과제인 것 같았다. 그런데 문제는 중국 학생들에게도 여전히 영어가 중요하고 서양서에 대한 학습이 간과될 수 없다는 사실이다. 그래서 마치 회의장의 분위기는 당대 중국이 세계화(globalization) 과정에서 겪는 문화

적 충격과 몸살을 교육 분야로 압축시켜놓은 듯한 느낌이 들었다. 사천(四川)대학 신문대학(新聞學院) 학장인 차오순칭(曹順慶) 교수가 5.4 운동 시기에 유행했던 수사를 인용해 ‘전반서화(全盤西化)’와 ‘전반복고(全盤復古)’를 모두 활용해야 할 때라고 한 것은 공존이 불가능한 개념이긴 하지만, 현 상황에 대한 풍자적인 비유가 될 것 같았다.

전반적으로 중국 대학의 학과장들이 고전 교육의 난점과 해결책에 대해 관심을 둔 반면, 뉴욕대학에서 온 장쉬둥(張旭東) 교수는 중국어문학 교육과 연구의 세계화를 강조했다. 그는 우선 텍스트 읽기 방법으로서 정전(canon, ‘經典’) 해석에서의 당대성 문제로 화두를 열었다. 즉 젊은 세대의 고전 읽기에는 현대적 방법이 필요하다는 것이다. 또한 그는 모두가 세계 일류대학을 만들려고 하지만, 일류의 기준은 결국 스스로에게 존재하기 때문에 저마다 나름대로의 가치를 만들어내는 것이 중요하다고 피력했다. 중국어문학 교육 및 연구의 개방과 세계화에 대해서는, 중국 내 중문과의 생존은 중국내에서 우위 뿐 아니라 학제적 범주를 넓히고 외국의 학과들과 상생할 때 가능하다고 말했다. 이런 문제의식은 특히 북경대 박사과정 학생이 기초학습은 잘 돼 있지만 지식의 생산과 평가·상상력·독해능력 등에서 외국의 유명대학에 못 미친다는 비판적 인식에서 비롯된 것이었다.

전체적으로 보면 중국 중문과의 학과장들이 대학 교육 현장에서 절감하는 문제들은 사실 우리가 한국에서 고민하는 것들과 크게 다르지 않을 것이다. 그들이 거론하는 인문학의 위기가 우리에게도 어제 오늘의 일은 아니다. 그러나 발제를 들으면서 또한 우리와는 다른 차이도 발견할 수 있었다. 우선 크게 보면 그들은 문화 시스템을 이분법적으로 중국과 서양으로 양분해놓고 전통의 계승과 세계화라는 과제를 바라보는 경향이 뚜렷했다. 이런 발상은 일견 단순한 점도 있지만, 논리의 내면에서 또한 중국의 달라진 위상이 읽혀졌다. 즉, 그들에게 국학의 육성은 상승하는 국가적 역량을 바탕으로 서구 학문이 누려온 우월한 지위에 대응하고자 하는 전략이 포함되어 있는 것이다. 이것은 혁명의 시대가 끝나고 개혁개방을 맞은 이후, 중국이 범국가적으로 새로운 문화 이념으로서 민족문화에 대한 자긍심을 강조해온 점과 맥을 같이 한다고 할 것이다. 그러나 상술한 북경대학 중문과의 역사에

서도 알 수 있듯이, 지금까지 중국에서의 근대화 내지는 현대화는 중국의 전통과 서양의 새로운 지식을 어떻게 수용하고 융합하느냐에 따라 기복을 달리해왔다. 아무리 민족 유산을 강조하더라도, 방법론으로서 이미 일반화된 서구의 지식은 여전히 간과될 수 없다. 더욱이 국학의 정수인 중국어문학에서조차 어느새 세계화의 추세를 무시할 수 없게 된 상황은 중국의 중국어문학 교육을 새로운 도전의 장으로 떠밀고 있다. 때문에 점차 주변화 되어가는 인문학의 활로를 모색하기 위해 전통의 계승과 세계화 사이에서 이루어지고 있는 그들의 실험과 도전에 대해 더욱 귀추가 주목된다고 하겠다.

그런데 여러 가지 공통분모가 존재함에도 불구하고, 중국어가 모국어인 나라의 중문과와 중국어가 외국어인 나라의 중문과 사이에는 교육방법이나 교육목표에서 본질적인 차이가 존재할 수밖에 없다. 일단 교육 시스템 면에서 현격한 차이가 있겠다. 현재 대학의 중문과가 종합적인 국학연구 단위로서 단과대학(文學院)으로 통합되는 것이 중국 대학의 일반적인 추세라면, 북경대나 복단(復旦)대는 오히려 중국어문학의 순수 영역을 고수하기 위해 학과체제를 유지하고 있는 상황이다. 그러나 체제를 바꾼 다른 대학도 중국어문학 중심의 '문학원'과 외국어문학을 다루는 '외국문학원(외국어문학 단과대학)'이 따로 존재하므로, 어느 쪽이든 중국어문학 학과의 기존 학제에서 크게 변화된 것은 아니다. 그런데 북경대학 중문과만 해도 고대문학·현대문학·당대(當代)문학·민간문학·문예이론·고전문헌·고대중국어·현대중국어·언어학·비교문학 등 10개에 이르는 교연실(敎研究室) 체제에 100여 명의 교수진으로 구성되어 있어 그 규모가 웬만한 단과대학에 상당한다. 중국의 중문과 학제가 이처럼 세분화된 것은 물론 중국어문학이 국학에서도 중심을 차지하는 학문이기 때문이다. 반면 '어문학'이라는 일반 영역보다는 '중국어'라는 특수 영역의 교육과 연구에 더 많은 사회적 기대를 받는 외국의 중국어문학 교육은 점차 지역학 연구와 결합하는 쪽으로 나가고 있는 추세이다. 심지어 미주나 유럽 지역에서는 이마저도 단일 중국을 벗어나 범 동아시아권을 아우르는 통합 학제로 융합되고 있다. 특수하고 전문화된 세부 영역보다는 다른 학제와의 융화를 통해 보다 일반화된 범주에서의 교육과 연구로 확장되고 있는 것이다. 그런 점에서

보면 중문과 학과장들이 고민하고 있는 문제는, 사실상 외국에서는 중문과가 아니라 국문과가 공감할 수 있는 문제가 될 수 있다. 그러다보니 전체적으로 논점이 중국내 중문과 교육의 문제로 모아진 대회 후반의 논의에서 필자 같은 외국 중문과의 학과장들은 거의가 논의 중심에서 배제될 수밖에 없었다. 물론 중국 학과장들의 인식을 읽어낼 수 있는 점에서 배울 점이 없었던 것은 아니지만, 외국학으로서 중국어문학에 접근하는 해외 참석자들을 위한 주최 측의 배려가 다소 아쉬웠다.

어찌 보면 학과장 포럼은 다음날부터 개최된 박사과정생 포럼의 프리올림픽 같은 성격을 지닌 면도 있었다. 학과장 포럼에 참석한 양안 3지의 학과장들은 대부분 박사과정 학생들을 대동하고 북경대학에 왔다. 박사과정생 포럼은 학과장 포럼과 달리 양안 3지를 아우르는 국내용 행사로 치러졌다. 외국 대학원생을 참여시키지 않은 것은, 원활한 언어 소통이 안 된다는 이유도 있었겠지만, 그보다 국제행사로 확대되면 대만의 정치적 성격이 애매해지기 때문이었다. 역설적으로 말해서, 대만을 국가로 인정할 수는 없지만 대학원생 포럼에서 배제하기에는 그 학문적 수준이 아깝다는 것이다. 아무튼 학과의 창설 기념행사 중 대학원생 토론을 주요 행사로 잡았다는 사실에 대해서는 매우 인상적이면서 일견 부러운 느낌도 들었다. 동행한 대학원생이 없는 필자는 결강을 하면서까지 대학원생 포럼에 참석할 수는 없었기에 곧바로 귀국길에 올랐다.

학과장 포럼이 진행된 날은 북경의 가을 날씨로는 드물게 하루 종일 비가 왔다. 포럼이 진행된 회의장은 공교롭게도 1934년 연경대학 신문과의 요청을 받고 중국을 방문한 미국 언론인 에드가 스노우(Edgar P. Snow)가 오랫동안 강의했던 곳이다. 그로부터 2년 뒤, 그는 연안(延安)으로 잠입, 마오쩌둥을 만나고 홍군을 취재했다. 그는 이 여정의 취재 기록인 《중국의 붉은 별》을 통해 서방세계에 홍군의 존재를 알렸다. 처음 스노우의 저작을 읽던 기억이 떠올라, 비가 멎은 뒤 찬바람을 맞으며 홀로 찾아간 그의 묘소는 매우 각별했다.

< 국문 요약 >

본고는 북경대학 중국어문학과의 창립 100주년에 즈음하여, 북경대학 중문과와 한국 중국어문학 교육의 관계에 대해 살펴보았다. 중국어문학 교육이 한국에서 형성되던 초기 단계에 북경대학 중문과는 재직 교수 또는 졸업생 등의 학맥을 통해 한국의 교육에 영향을 끼쳤다. 그러나 주지하다시피, 1949년 중국의 사회주의 정부 수립에서 1992년 한중 수교까지 긴 단절의 시간을 가져야 했다. 이에 대해서 본고에서는 초기 교류 상황과 단절기 한국 중문과 교육의 특징에 대한 간단한 서술로 정리하였다. 이어 1992년 이후 한국 중국어문학

교육의 질적인 변화양상을 몇 가지로 나누어 살펴보고, 이와 관련하여 새롭게 시작된 북경대학 중문과와 한국 대학 중문과 사이의 교류양상에 대해 서술하였다. 결론부분에서 본고는, 새로운 변화를 맞고 있는 한국의 중국어문학 교육의 특징을 소개하고, 한국 중문과와 북경대 중문과 교류에 있어 한국적 상황에 맞는 향후의 발전 방향에 대해서 진단하였다.

주제어: 한국 중국어문학 교육, 중어중문학과, 북경대학 중문과 창설 100주년, 웨이젠공(魏建功), 한중 문화교류.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0.9.30	2010.10.30	2010.11.6	2010.11.8	2010.11.30